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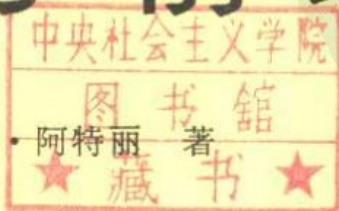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扬子前线

〔英〕 弗雷达·阿特丽 著

石梅林 译 尊闻 校



705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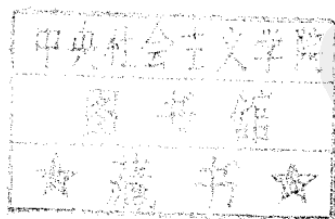
200210235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扬子前线

〔英〕 弗雷达·阿特丽 著

石梅林 译 尊闻 校



新华出版社

PDG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扬子前线

〔英〕弗雷达·阿特丽 著

石梅林 译 尊闻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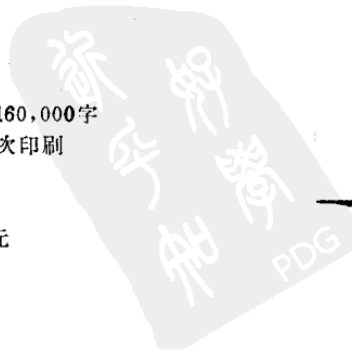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插页2张 160,000字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011-0113-2/I·18

统一书号：10203·232 定价：1.55元



前 言

许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各国新闻界的极大注意。世界各国曾有无数的立场不同的新闻记者，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络绎不绝地来到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度。但在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军事封锁，中国人民在红色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称解放区）所创造的革命业绩，并不为外人所详知。

首先冲破这种封锁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于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接踵而来的，是他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威尔士）写了著名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此后，他们都又多次访问中国）。接着，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爆发了持续八

DM76/14

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这个时候，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斯诺所走过的路，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或者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在这里同中国解放区军民亲切相处，目睹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和埃德加·斯诺一样，精心观察、研究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情况的著作。在这里，他们不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严正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过解放区，也常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解放区的资料。尽管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各有各的政治立场，但都毫不例外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个时期，由于这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的努力，产生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著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象斯诺一样，为促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不息，作出了贡献。

现在，我们计划出版一套丛书，专门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包括作家或其他方面人士）所写的，报道或者论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迹的著作。

出版这些著作的目的有二：

一是为我国新闻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看看这些外国同行如何观察、分析、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采访与写

作的角度，看看他们如何表现这些重大事件？他们的文采怎样？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特别是有些出自名家手笔的佳作，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相比较，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较迟，发展较慢，技术设备等也比较落后，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近百年来，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中国兴起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它就显现出磅礴的气势，使得剥削阶级的一切报刊相形见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在解放区则有十分严重的物质困难（这是国民党及外国侵略者的封锁造成的），它却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全国解放，最终打破了桎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种种障碍，使它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时期。在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即使有了今日这样空前规模的发展，想到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前景，也不能妄自尊大，还应看到不足的地方。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拿别人的长处来补救自己的短缺，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目的。

二是为我国的中共党史、现代史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我们选编的这些著作，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每本书都或多或少地，或详或略地记述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派

势力的动态，涉及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国民政府是在中国大陆上进行反动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一方面，它一贯地压制言论自由，实行原稿审查酷政，不许报刊反映事实的真相，他们象怕揭露自己身上的脓疮一样，害怕被人揭露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现象、反动措施以及人民极端痛苦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只知穷兵黩武，不思进行建设，而在有关统计、图书馆、博物馆方面的建树，几等于零。这个政府囿于短视的眼光和狭隘的阶级私利，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仍继续执行压制群众、限制言论，特别限制报刊报道共产党、解放区、全国人民群众的抗战业绩。而在各解放区内，虽有民主自由的环境，人民的新闻事业有了广阔发展余地，但是由于战争的残酷破坏，频繁的战争所造成的人们的奔忙，日寇、汪精卫、蒋介石三方的严密封锁造成的异常严重的物质困难，当时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也难系统地整理、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一个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其最大的困难和苦恼，就是缺乏系统地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或社会调查统计材料。现在选编出版的这些著作中的资料，尽管是一些片断，在内容上比较零碎，或者就其准确性上说来也不尽确切。但是，根据我们读后的印象，毕竟大多数是比较翔实可靠的。当然，由于作者的立场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述，往往表现很大的差异，确属难以避免的现象。只要我们认真查对其他有关资料，认真地进行分析，是能够识别有关资料的真伪的。

基于以上考虑，这套丛书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每本书的内容，首先衡量有无研究，参考的价值。如果在资料价值方面不足，而有流畅的文笔，在文章风格方面又有可取之处，也酌情少量选入。

这套丛书定名为“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编选工作根据有关著作搜集情况而定。但在装帧、封面以及印制规格上力求统一。根据现在已汇集的著作，初步计划出版十本，准备一、两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大部分是过去出版过的中译本。这次重新出版的时候只要原来译文通顺，忠于原著，只在文字上作些整理（主要是改正错字，个别词句上的文字修饰），尽可能地统一译名，但若寻找不到原著而有译名与别处不一致的地方，暂时只好保持原貌。如果发现原来译本毛病较多，则拟请有关同志对照原著加以校订、修改或者重译。还有一些内容充实，在过去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尚未译成中文的，拟约请人翻译。如果能够找到有关资料，对每本书的原著者生平（或其有关著作当时发生的影响，所起的作用），作一简短的介绍。

目 录

第一章	天堂与炼狱.....	(1)
第二章	武汉三镇.....	(26)
第三章	初次由汉口到前线.....	(76)
第四章	中国红十字军医处	(111)
第五章	再到扬子前线	(146)
第六章	陷落之前的汉口	(179)
第七章	中国会不会战胜?	(216)
第八章	日本侵华的目的	(235)
跋	穆欣	(249)

第一章 天堂与炼狱

一 香 港

经过了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三星期太阳下的那种闲散生活之后，我在一个七月的清晨到达了香港。在我告别英伦的时候，我早就害怕等不到我抵达汉口，也许汉口就已经失陷了吧，而这种急迫的感觉使我在这一个可爱都市中多耽搁几天研究研究所谓“香港心理”这念头也受了阻遏。不消说，即使我在那里仅作短期的勾留，也已尽够使我相信：现在，在香港的英国人所表现的老“上海心理，”比在上海表现得更厉害。香港的存在，以及香港白种黄种居民的生活，虽则有赖于中国的胜利，然而许许多多英国人仍然把中国看作十年前的中国，害怕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比害怕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厉害，甚至香港的英籍中国财主认购一九一四年欧战时期的公债，也比这一次慷慨得多。

一九三八年的香港，是世界最繁荣的都市之一。原来，自一九三七年秋天，上海沦陷以来，它就成为对华贸易的主要商港了，这是除开在华的日本贸易而说的；它也是吸收中国流动资本的一块磁石，香港虽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却是

英国皇家的殖民地，它固然受战事的影响，却并不在战事的范围以内。香港发了战争的财，它不比中国的各城市，用不着担心日军的炸弹或炮舰。很显然的，它的生命线是广州和中国内地一旦在政治上和地理上被切断了的话，香港便必然变成东方的维也纳——一个失了营养的机构。香港毕竟不同于上海，在上海，日军的存在，日人的狂妄和傲慢，永远使在华“白种人”认清了：如果日本战胜中国，白种人将陷于怎样一个可怕的局面，而香港却是巧妙地脱离着战争。英国人在这里继续过着他们在东方所过惯了的舒服而又享福的生活，至于中国的财主，则好象洪流一样汇聚在酒楼和咖啡店里，夸示着他们的富足，恬然不以为耻。香港更拒设难民收容所以援救从广州逃难出来的贫苦无告的人们，而且，从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华侨那里为中国募集捐款，也比在香港募集容易得多。

在香港，另一种形式的难民也很多，并不是那向着中国内地作长途跋涉的或麇集在未沦陷的中国各城市的挨饿，褴褛，而惨苦的群众；也不是那露宿在上海街头而至于慢慢倒毙者每天竟达数百人之多的绝望的男女和孩子。香港难民，大部分是有吃，有穿的，算得是小康的，这些都是离开广州来逃避长期空袭的人家；有些是带了他们的资金从别一些城市来的，不顾战局的结果如何，只想保持他们的财富；有些则是广州和汉口的政府官员的妻孥待在这里，以保安全。除了最热心爱国的分子以外，任何人只是要力所能及，大抵都已避来香港，或至少已经把他们的眷属送到香港来

了。中国的汇划统制是有的，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容许这么多的“国币”流入香港的。一方面，事实上，中国的公务人员，能保持廉洁的本来就很难得，同时，还有一种困难，就是中国土地上的外国租界的存在和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地位。倘没有外国银行的彻底合作，中国资金的实际统制是不可能的。在此刻，香港属于英国，故已处于战区以外，说这是有裨于中国，固然是事实，可是由于它的存在，正如由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存在一样，反使有钱的中国人逃避了中国捐税，而且把他们的财富输出到中国以外去了。

香港物价一天天的腾涨，营业一天天的繁盛；各家旅馆都挤满了旅客，房价增加了一倍。无论咖啡店，酒楼，或商铺，也都挤满了主顾。中国的各个城市正在战乱之中流血，香港却肥胖起来了。

这毕竟是一种变态的繁荣。日军随时有进攻广州的可能，有把香港跟它的财富来源切断的可能。人们也发生着这样的疑虑：难道日军不会攻取香港吗？英国会不会决心保卫香港呢？无论日军采取哪一种行动方式，那是明白得好像墙上的告示似的事，而香港的欢乐，终究是带些儿肺癆症的兴奋。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九龙成了世界上最拥挤的商埠。九龙是中国大陆上与香港相对的“租借地，”在这里通着五百五十英里长的铁路线，经广州而达汉口。我所搭的那艘德国船，开始以最高的速率卸下德国售与中国的军火，然后又驶到神户去卸下售与日本的军火，在德国船的旁边，有一只意大

利商船，也正在卸下军用品。英国船，法国船，苏联船，美国船，都停泊在九龙埠头附近。中国从各国购入的军火都由此运到长沙或汉口去。沿铁路线一带，虽说每天都遭到日机的轰炸，然而日本并不曾达到破坏目的。中国正利用着它战前在海外所储存着的外汇和白银准备，并大量输出茶叶、桐油、锰、镁、钨、及其他物品，以作支付的新代价。中国深知日军随时都有袭击广州并进占汉口的企图，因此它正在热烈地尽量布置着军事上的准备。所以到了十月间，虽然汉口和广州都被侵略者夺取了，可是中国政界方面依然声称：当时中国的军火准备，还足能够继续供给军事上的需要，甚至可以支持九个月之久。

这些军火的运卸，并不严守什么秘密。这是不必要的，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而且是属于英国的。谁都可以随意出入于庞大的船埠上，看着苦力们背负着重重的箱子，流着汗，或者在水闸旁边打瞌睡，留心着搬运货物。我见过一艘挂英国旗的船只，船上的大副是英国人，船主人是寓居香港的几个法国尼姑，船长是美国人，而工程师和二副则是日本人，这艘船从苏联国境敖得萨地方载来了一批军火。这种情形，可说是航运事业——或者也可说是军火事业——上的“国际主义”吧。据说，在香港，不售与中日任何一方的唯一军火商，就只有捷克的司科达公司。在香港是难于保持“为民主而战”的幻想的。倒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目前已经绝迹了的战后文学作品中的警告，那些作品指出了一边人们为着理想或意识而战斗，同时，在另一边，世界军备竞争的

阴谋又是怎样地煽动着战争和战争的谣诼。后来，我又听得一个在华的法国的犬儒主义的老神父说：中日战事将要持续到英、法、美三国所希冀的使中日双方必须就范的日子。

典型的香港外国人既不理解中国所受的苦难，也不能容忍新中国或中国民族复兴等等形势的出现，到处是诽谤和轻蔑，说中国官员是如何如何的贪财。他们只看见旧中国的个人主义和任用私人的积习，却不愿看见新中国正在炮火中壮大起来。今日的中国，正象一支脱毛换皮的动物，旧的皮毛虽然还有不少的残留，可是人们如果再凑近去一瞧，便可瞧见新的皮毛是正在那里生长了。

再者，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忘掉各国在战时都有靠战争发财的人，同时又忘掉英国的更隐秘的更绅士化的腐败方式。日本的腐败状态，是每一个阅读日本报纸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日本的历史更显示了明治维新时代中高级官吏和将领的腐败。

香港的不幸是在这里所能看见的不过是战时中国的坏的方面。这里是一切不知爱国的富翁的荟萃之区，这里又是军火贩卖者和购买者会晤的地方。他们看不见中国人的战斗，也感不到中国的精神。即使他们看见或是感觉着了，那也不过唤起了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间的回忆，他们曾经在那个时期反帝浪潮面前，为着他们自身的生存而发抖，或为着他们的利润而战栗。此后三个半月，当我前往视察上海时，我曾因英国人态度不同而大吃一惊。因为在上海，中国的新的素质已经逐渐显露；在上海，英国军官也歌颂着八百孤军的壮

烈和中国士兵的英勇；他们所有的武器既不精良，而又在大不利的条件之下作战，但是他们竟能坚持抵抗日军，达四个月之久。在上海，也已经难得有人存着“日本一旦战胜中国时还能容许英美继续经营对华贸易”的幻想。

香港有许多很有趣的人物可以去访问：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同时是蒋介石夫人之姊的宋庆龄；她的弟弟，即最干练最有名的银行界首脑宋子文；还有那多年来亡命巴黎最近才回国而又为右派所不容的陈友仁，他在港沪各报攻击蒋的政策，期待着或至少是希望着他会被召回复职。

陈友仁这个名字，在过去，是英国人最畏惧最怀恨的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那是当陈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他代表中国要求把汉口租界交还中国——民国十六年签订的中英协定。现在，他寓居九龙的一个小小的屋子里，不为英国所重视，也不为中国所信赖。从英国人的目光看来，他仿佛是国民党革命时期中最不妥协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他的名字，使英国人不免回想到从前的事，以为蔑视英国而又侵袭英帝国主义利益的乃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我发现陈友仁是一个最激烈的谈话者和锐利的观察者和思想者。他也许是富于野心的吧，但是在显要的人物之中，究竟谁是没有野心呢？无疑的，他了解西欧及其种种政策，非一般中国人所能及。他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一样，主张与苏联密切合作，可是他并不是对苏联有什么幻想。现在，他更主张跟英国携手，为的是中英利益一致。他是现实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并不为中

国人民所爱戴。另一个原因，是在于他一向生长于西印度，不懂中国话，无论对于中国和中国的思想方法，都似乎陌生得象一个外国人一样，不足以了解本国的人民。

我两次访问陈友仁于九龙郊外的小住宅内，谈也谈得很久，他反反复复地强调着说，中国缺乏军械制造厂是现势中应注意的主要的着眼点。他说：

“中国并不能单独获得胜利，中国正需要联盟。我们不但应该建立一个军事阵线，同时也得建立一个外交阵线才好。……日本正在对我们发动全体性的战争，所以我们的抗战也应该是全体性的。……

“在一九三二年，日本还不曾建立现代化的空军。那时，我们早就有了创造空军力量的机会。不幸，中国虽然募集了航空捐款，但当此次战事爆发时，我们所有的飞机还只有一百五十八架至一百六十七架光景呢。……

“再其次，就是德国顾问问题。当时，德国派他们来华，是认为蒋介石的历史任务，乃在于扫除残余的军阀，使中国一变而为推销德国商品的广大市场。自希特勒执政以来，蒋介石的‘任务’也变了，变为反对苏联了。德国趁此把武力的援助，军事的设备，以及军事顾问，尽量供给中国，因为里宾特洛甫认为使被侵略者和侵略者妥协，组成反苏集团，是可能的事，实际上他却没有认清楚这一政策的矛盾性。此次抗战以来，进展至今，更显示了不可避免的现实，于是紧随着希特勒在去年（一九三八）一月间的演说，德国便召回了他们的顾问。希特勒十分明白：他到底是失掉

中国这一市场的好呢，还是失掉日本那一个军事同盟的好呢。德国的经济利益，终于为着它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掉了。

“德国顾问主张堡垒和空军政策是错误的。他们所谓不能破坏的与登堡防线的理论，在幅员这么广大的中国，是不中用的。他们固然是优秀的练兵官，但这究竟不是我们所急需的，他们的观念和战术也是不适用于中国的。”

几个月后，当我离开汉口的晚上，我偶然想起我们这部分的谈话。那时我正在和蒋介石的侍卫主任，同时又是蒋的顾问司汀尼斯大尉（Captain Stennes）一同散步于飞机场上。司汀尼斯是德国左翼国社党人又是施莱彻将军的僚友。他得着妻子的助力，从集中营里脱逃了出来，现在亡命于中国。他是冒险家的十足的典型，什么都不怕，头脑既伶俐，体格也是一种英雄气概的标本，而且具有一种动人的性格，他诅咒希特勒，而对于蒋总裁却表示了真切的忠诚，好感和敬佩。他的心目中，认为德国顾问对于中国的贡献是十分重大的。他说：

“法国人太倨傲，太浮躁，做中国军事顾问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他们把中国要做的事告诉了中国当局，如果中国不照他的指示去办，他只是耸耸肩便算完事。英国人呢，太懒惰，所以也不行。只有德国人才富于必要的忍耐心，你如果看到中国当局采用福刚霍森（Von Falkenhausen）计划的过程，你便会认出他的老练和忍耐。他从不说，‘我想这是应该干的事。’他往往只说：‘我想最好的策略是你一二星期以前所提议的那个计划。’说好了这么一句，他便去